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下乡的实践路径探索

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许世林 刘家琦

1943年12月2日,凛冽的西北风掠过延安的沟峁。42名延大鲁艺师生把戏服、乐器、画具和简单的行李背上肩头,这42名师生组成了一个工作团,在张庚、田方带领下,向绥德分区出发。他们计划在此后四个多月,走往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子洲等地,在学校、村庄和群众集会上演戏、唱歌、作画;听乡亲们说生产,说日子,说心里的盼头。并于次年4月返回延安。

工作团的鞋底踩过冻土和薄雪,“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回响,一串脚印从桥儿沟伸向陕北深处,寒风很快吹散了师生的说话声,脚步加得更快了,他们的身影隐藏进了夜幕之中,一团文艺星火却开始在陕北的黑夜灼灼燃烧。

从长征路上走来的文艺火种。

在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 央红军主力从于都河畔踏上长征时,中央苏区工农剧社的李伯钊、钱壮飞、胡底、危拱之等领导和文艺骨干随军出发。长征的路上,文艺工作者既当战士,又当宣传员;用歌声、演剧和标语把红军的主张播撒在沿途群众心中。工作团此次的文艺入基层,是对长征的文艺火种的薪火相传。

此时,好多文艺工作者的作品与群众精神世界的需求格格不入,面对文艺界出现的问题,鲁迅艺术学院师生意识到不仅仅要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议精神,更要学习并践行长征中文艺宣传的方式。把窑洞里的“小鲁艺”的剧本编写好,把工农兵生活和斗争的“大鲁艺”的剧目演好。在1943年冬天,鲁艺师生便组成了工作团,踏雪北上,去听群众中军民相助、民族团结的故事,去群众的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物典型与人民群众的光荣事迹来创作剧本,用群众语言去打磨剧目,把戏真正演进群众心里。

把戏演进群众的日子里。

待工作团下乡之后,工作团开始寻找演出场地,但找来找去,却始终没有发现合适的戏院。工作团师生思考一番,决定使用学校的空地、村里的场院作为演出地点,一来方便十里八乡的群众前来观看,二来搭临时舞台省时省力;可以把窑洞当作演出的后台,桌凳和门板当成演出的戏具。不久,工作团准备就绪,先是贴了演出告示,而后敲响锣鼓宣传演出的时间地点。到了演出的那天,来这里看戏的人,出乎了工作团的预料,十里八乡的群众几乎都聚拢过来了。工作团面对这样的架势,不由心生紧张,十分害怕演砸了,演出的剧目不受群众喜欢,于是工作团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群众共演一场戏。

工作团先后演出了《兄妹开荒》《二流子变英雄》《血泪仇》,这一次工作团成员与群众共同演绎戏目,群众既是演出者,又是观看者,更是亲身经历者。《兄妹开荒》唱的是兄妹勤劳开荒、发展生产;《二流子变英雄》写的是落后者在劳动和集体帮助中发生转变;《血泪仇》讲的是一个农民家庭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悲惨遭遇,投奔陕甘宁边区后迎来新生的故事。工作团的这些剧目都是从群众生活中改编而来的 ,戏目里没有封建礼教高高在上的说教,有的只是开荒、纺线、互助、支前这些乡亲们创作的劳动过程。戏目情节也没什么大起大落,但它和群众日常生活紧密贴合,它成了边区群众真正需要的精神食粮。

这一次,场院小舞台上的演出,意义已超越了舞台本身。工作团汇集了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台下则坐着农民、士兵、基层干部和地方文化工作者。他们经历不同、口音不同,却因抗战救国和建设边区走到一起。工作团通过几个简单戏目,搭起了彼此沟通的桥梁:知识分子理解了农民的生活,群众听懂了党的主张,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共同抗战、共同建设的信念。

长征路上的宣传队曾把革命道理送到村寨,鲁艺工作团则把共同抗战、建设边区的道理唱进场院。两者是一脉相承的:不照搬文件语言,不把群众只当作被动的听众,而是从真实生活里取材,用听得懂的乡音、看得惯的秧歌和秦腔讲述共同的事业。这样创作出来的剧目,才可能让群众在人物命运中明白道理,在笑声和泪水中形成认同。

一出戏演完,并不等于工作团任务的结束。群众十分开心地看到了戏剧的演出,工作团也找到了文艺发展的方向,但群众看戏时的笑与不笑,听到某句唱词时的点头或沉默,都成为工作团后续修改剧目的依据。

工作团成员白天访问、记录,晚上围着油灯整理材料;向劳动能手问生产,向民间艺人学唱腔,留心妇女纺线、变工队互助和复员军人回乡生产的细节。让原本在工作团脑海中书本知识,扎根于这广阔的黄土地之中。

风雪散去,足音仍在。

风雪早已散去,从延安通往绥德的山路也换了模样。可回望那串脚印,仍能看见一束朴素而明亮的文艺星火:它从长征路上一路传来,又在边区场院被群众的生活重新点燃,在新时代星火燎原。

1944年4月,鲁艺工作团返回延安。工作团出发时带去的戏箱已经磨旧,笔记本上也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东西,风雪却没有给工作团带来沧桑,反而,点燃了工作团心中的熊熊大火。细看工作团在过去的四个多月里,演出专场68次,作调查66次;创作大小剧本16个、歌曲7首,收集民间歌曲和剧本约400个、民间剪纸160幅……工作团早已经把自己对文艺的热爱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融为一体。

工作团从那些民歌、剪纸和地方戏曲中,探寻乡亲们喜欢的节奏、语言和故事,并渐渐地把抗战与生产的新故事融入其中。这些民间艺术形式,逐渐变成了一种共同理解的文化语言和精神动力。共同推动了人民文艺的成长,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长征途中的宣传队、剧社,到延安时期踏雪下乡的鲁艺工作团,行程不同,脚步却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向人民,依靠人民,团结人民。九十年前的长征胜利,靠的是同人民生死相依,也靠的是各族群众和一切进步力量的理解与支持;延安时期党的发展,依靠的是党同人民血浓于水的鱼水深情,以及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党成立105年后的今天,文艺的样式正不断发生着变化,但党初心如磐,号召着文艺工作者要去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把人民当成江山,把江山当作人民。

于闲处见初心:老一辈革命家学习与运动中的革命风骨

李慧芳

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如何度过闲暇,决定一个人的成长与干事状态。老一辈革命家既是革命事业的奉献者,也保有生活情趣。他们的闲暇生活服务于革命事业,将读书运动、磨砺意志、陶冶情操融为一体,始终紧扣革命工作。

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嗜书如命,把读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无论在戎马倥偬的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都以书为伴。

系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是他们一生的读书习惯。1938年,毛泽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遗产》中强调,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陈云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中亦指出,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

在理论书籍之外,他们也各有偏好。毛泽东少年时爱读中国旧小说,特别钟情于造反故事;对《红楼梦》有特殊感情,反复研读。出于治国需要,他还研读宗教经典,主张共产党员研究各宗教经典以做好群众工作。陈毅则从古书中汲取智慧,旁征博引,指出要善于正确对待历史人物。

长期的读书实践,让他们总结出一套读书方法。其一,不动笔墨不读书。毛泽东在几本哲学书籍上写下约两万字批语,最长一条达一千二百字。其二,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他认为向社会做调查,“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其三,注重思考。谢觉哉讲联系思索过往当下,才能看得更清更远,发掘书面未言的道理。其四,定量有恒。徐特立学习外语,每天只学一个单词,日积月累终有所成。其五,虚心向他人学习,甘当小学生。这些读书智慧至今仍值得当代青年借鉴。

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老一辈革命家重视体育锻炼,目的是更好地革命,更长久地为革命作贡献。徐特立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身体好,才能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谢觉哉专门论述《体育活动的好处》,认为学习工作要有身体来支撑,驳斥了工作忙没时间锻炼、靠增加营养和休息就够了的错误看法。

散步是许多革命家的选择。徐特立名言是“坐似钟,立似松,行似风”,劝人多走路,莫把腿坐软了。邓小平自1959年腿骨折后数十年坚持散步,晚年常在自家小院边散步边思考重大问题。陈云喜欢“踱方步”,以此从日常事务中抽身,考虑战略问题。

游泳同样深受喜爱。毛泽东将其视为与困难、恶势力作斗争、抒发豪情的载体,二十岁便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诗句。徐特立五十二岁学会游泳,还教会许多延安同志。邓小平几乎每年夏季到北戴河游泳,直至八十八岁高龄一年仍游了八次。

他们还勇攀高峰,登高望远。青年毛泽东为磨炼意志,与蔡和森、张昆弟常往岳麓山顶的爱晚亭沉思。1963年,77岁的朱德和86岁的徐特立健步登上桂林明月峰并赋诗唱和;1975年,89岁高龄的朱德拄杖最后一次登山,登上北京郊区的青山。

老一辈革命家的业余生活很简单,却很充实。在繁忙工作之余,他们用有限闲暇松弛神经、锻炼身体,做着“心之所好”的有益之事。他们的闲暇娱乐活动,政治功能远大于娱乐功能——事实上,他们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还指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说的‘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老一辈革命家正是践行这一要求的生动典范。回望他们于闲暇之中读书修心、运动强身的往事,助我们读懂共产党人的初心本色。新征程上,我们当以先辈为榜样,坚持勤学固本、健体励志,在读书中涵养精神,在锻炼中锤炼意志,自觉赓续红色血脉,把革命风骨转化为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北抗战记忆的建构及其价值研究”(25BDJ028)、天津市教委科研项目(2024SK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

以多方共治破解正确政绩观践行梗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筱娴

“德惟善政,政以绩显。”政绩是干部履职成效的集中体现,而政绩观则是干部创造政绩的思想根源与价值遵循。作为根本性问题,政绩观问题同样深刻影响区域发展质量与民生保障水平。在推进地方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安徽同国内许多地区一样,围绕基层项目落地、绿色产业培育等开展了有益探索,尝试以多元评价方式校准干事创业的方向。直至今日,关于政绩观的讨论仍经久不衰,而既往对政绩观的探讨多侧重将领导干部个体作为重点约束和整改对象。事实上,正确政绩观在转化为现实行动的过程中涉及不同层级和领域的行动主体,因此需着眼于不同主体的职能定位及联动关系展开改进工作。

一、锚定核心践行主体,以党性修养校准领导干部政绩观航向。领导干部是政绩创造的主体,也是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核心践行者。

第一,党员干部的党性立场是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支撑。从价值本源来看,公私之辨既是评判干部党性水平的重要标尺,也是辨别政绩观正误的关键界限。干部应坚守理想信念,把为民谋利作为干事履职的价值归宿,摒弃私心杂念,从思想源头上筑牢正确政绩观的内在根基。

第二,培育和形成辩证思维是党员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方法遵循。党员干部创造政绩的过程就是不断协调各类矛盾、权衡多重发展目标的过程,这就要求其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妥善处理显绩与潜绩、发展与民生、局部与全局、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现实关系。

第三,真抓实干是党员干部创造过硬实绩的唯一路径。马克思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领导干部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必须立足客观实际,尊重发展规律与群众现实诉求,力戒虚功,务求实效,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强化制度保障主体,以考核体系构建正确政绩观引导机制。干部个体思想自觉具备主观性和不稳定性,仅依靠党性自我锤炼难以完成政绩观的全面纠偏与长效巩固。作为政绩观建设的保障与导向主体,组织与考核机构承担着教育引导、考评遴选、纠偏问责等职能,既是连通干部与社会评价的关键纽带,也是塑造干部政绩取向的“指挥棒”。

一方面,党组织需依托常态化思政教育,精准纠治干部政绩观偏差问题。面对履职过程中出现的不作为、怠政以及权力失范等现实问题,相关机构应分类处置,精准施策,落实常态化教育整改,健全问责约束机制,从组织治理层面压缩错误政绩观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制度保障主体需持续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政绩观偏差现象反复出现,部分源于传统考核模式在指标设置、运行流程上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对此,考核机构应搭建科学、可适配不同场景的常态化考核框架,锚定发展质量这一核心方向,统筹经济效能、民生实效、问题整改等多元评价维度,推进考核工作走向规范有序。具体而言,需结合各地资源条件落实差异化考核,动态调整各项指标权重,兼顾约束惩戒与正向激励;破除考核过程中的信息阻隔,避免评价来源单一,保障考核结果如实反映干部履职状况,为正确政绩观落地筑牢制度基础。

三、夯实价值评价主体,以人民主体地位彰显正确政绩观根本立场。人民群众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也是政绩成效的直接受益者和评判者。若缺少群众的评价与外部监督,政绩评判极易陷入内部闭环,偏离为民谋利的价值取向。

从价值逻辑来看,正确政绩观内在蕴含以群众利益为导向的价值内核,政绩生成的全部环节都应回应群众现实诉求。践行正确政绩观,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方法的现实展开,倘若政绩打造脱离群众诉求与基层客观条件,其终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实践向度而言,群众的评价监督能够补齐干部内部考核与自我约束的短板空缺,完善多元制衡体系。长期以来,党员干部的自身监督存在流程滞后性和信息片面性问题,反之,群众口碑、民生满意度却能够最真实反映政绩成效好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应停留于抽象的政治口号,而应落实到具体的实践要求上,因此需畅通群众参与政绩监督的正规渠道,将公众评价结果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四、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共建正确政绩观长效践行机制。正确政绩观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课题,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的个体自觉、组织体系的制度引导、人民群众的评价监督并非各自孤立运行,而是相互支撑、同向发力的有机整体,实现该体系内部的协同联动则成为了纠治政绩观偏差、构建长效治理机制的核心路径。因此基于三类主体的职责边界,应破除主体间的沟通阻隔,弥补联动环节中存在的不足,充分释放多方参与带来的共治效能。

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运转关键在于消解各类主体间的现实壁垒,促成组织与群众评判的有机衔接,达成制度约束和个体思想自觉的双向统一。这要求在政绩考评环节提高公开程度,保障群众对考核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要求干部深入基层,将群众现实诉求作为决策谋划的基本依据;组织在优化考评规则的过程中也应坚守为民谋利的价值导向,确保制度设计不偏离实践初衷。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应聚焦多元主体的同频共振,同向共进,画出以人民利益为圆心、以实干担当为半径的最大同心圆,让正确政绩观真正落地生根,为地方各项事业稳步向前提供有力支撑。